

美国研究型大学探索译丛

主 编 张斌贤

副主编 王 晨

达雷尔·R·刘易斯 詹姆斯·赫恩 著

Edited by Darrell R. Lewis & James Hearn

杨克瑞 王 晨 译校

The Public Research University:
Serving the Public Good in New Times

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

——为新时代公共利益服务

河北大学出版社
Hebei University Press



主 编 张斌贤 副主编 王 晨

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

——为新时代公共利益服务

The Public Research University:
Serving the Public Good in New Times

达雷尔·R·刘易斯 詹姆斯·赫恩 著

Edited by Darrell R. Lewis & James Hearn

杨克瑞 王 晨 译校

河北大学出版社
Hebei University Press

美国研究型大学探索译丛

冀图登字: 03-2004-013

© Th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2003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2003 by the Rowman & Littlefield, and introduced by the Copyright Agency of China (本书由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代理引进,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 物华大厦5层; 电话: 010-680039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 为新时代公共利益服务

(美) 刘易斯, 赫恩著; 杨克瑞, 王晨译校.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7.11

(美国研究型大学探索译丛/张斌贤主编)

ISBN 978-7-81097-203-1

I. 美… II. ①刘…②赫…③杨…④王… III. 公立学校:

高等学校—概况—美国 IV. G94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55440号

责任编辑/何 屹 电话: 0312-5921813 Email: heyi2817@sina.com

装帧设计/王占梅

责任印制/蔡进建

出版: 河北大学出版社(保定市五四东路180号)

印制: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张: 16

字数: 234千字

规格: 1/16(787mm×960mm)

版次: 2008年2月第1版

印次: 2008年2月第1次

书号: ISBN 978-7-81097-203-1/G·586

定价: 32.00元

美国研究型大学探索译丛

主
编 张斌贤
副主编 王
晨

总序

研究型大学(research university)这个概念最初是由卡内基基金会在其《高等教育机构分类》(A Classification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1973)中提出的。制定这个分类的初衷是“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出于确信有必要创立一个能够鉴别大学的不同职能类型,并使其差别合法化的新的分类体系”。^①这个分类为当时美国 2800 多所高等教育机构设计了一个多样化的分类体系,即把高等教育机构分为博士学位授予大学(Doctorate-granting institutions)、综合性大学和学院(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s)、两年制学院(Two-year colleges)和专门学院(Specialized institutions)等五大类。在博士学位授予大学中,又按照每年从联邦获得科研经费和授予博士学位的数量,分为研究型大学Ⅰ类、研究型大学Ⅱ类和博士学位授予大学Ⅰ类和博士学位授予大学Ⅱ类。^②

根据卡内基基金会《高等教育机构分类》(1973 年),在当时全美 2837 所高等教育机构中,五大类高等教育机构的分布是:

机构类型	数量	占全部高等教育机构的比例(%)
博士学位授予大学	173	6.1
研究型大学Ⅰ类	52	1.8
研究型大学Ⅱ类	40	1.4
博士学位授予大学Ⅰ类	53	1.9
博士学位授予大学Ⅱ类	28	1.0
综合性大学和学院	456	16.1
文理学院	721	25.4
两年制学院	1063	37.5
专门学院	424	14.9
总计	2837	100

这个分类经历了1976年、1987年、1994年和2000年四次较大的修改,并计划于2005年再进行修改。^③目前使用的是2000年的分类。这个分类与1973年的分类有了较大的变化。2000年的《高等教育机构分类》把高等教育机构分为6大类,即:博士学位授予大学——研究型大学(Doctoral/Research Universities)、硕士学位授予学院与大学(Master'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学士学位授予学院(Baccalaureate Colleges)、副学士学位授予学院(Associate's Colleges)、专门学院(Specialized Institutions)和部落学院与大学(Trib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其中,在博士学位授予大学——研究型大学中,根据授予博士学位的范围,又分为“广泛型”(Doctoral/Research Universities-Extensive)和“集中型”(Doctoral/Research Universities-Intensive)两类,二者的不同在于,前者每年在不少于15个学科授予不少于50个博士学位,而后者每年在3个或更多的学科至少授予10个博士学位,或每年一共至少授予20个博士学位。在其余四大类(部落学院和大学除外)机构中,又根据学科的不同细分为不同的类型。

根据卡内基基金会《高等教育机构分类》(2000年),在全美3941所高等教育机构中,六大类高等教育机构的分布是:

机构类型	数量	占全部高等教育机构的比例(%)
博士学位授予—研究型大学	261	6.6
“广泛型”	151	3.8
“集中型”	110	2.8
硕士学位授予学院与大学	611	15.5
学士学位授予学院	606	15.4
副学士学位授予学院	1669	42.3
专门学院	766	19.4
部落学院与大学	28	0.7
总计	3941	100

自1998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的讲话发表以来,“世界一流大学”、“世界高水平大学”和“研究型大学”,逐渐成为国内高等教育界普遍使用、且使用频率非常高的“关键词”。根据粗略统计,在我国1000多所高等院校中,至少200所院校在其发展目标或战略规划中,使用了“研究型”、“研究—教学型”或“教学—研究型”之类的字样。

同样,在有关高等教育的研究中,研究型大学概念出现的频率也不断增大。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等文献资源库上进行的调查显示,自1998~2004年,国内学者先后发表的有关研究型大学的论文超过了398篇。

应当说,在我国高等教育近几十年的发展历史中,很少有一个直接来自国外的名词或术语会在不到7年的时间里,成为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乃至影响我们对高等教育思考的“大观念”。

那么,我们(无论是高等教育机构的领导人还是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学者)究竟对这个如此深刻地影响了我们思维和行为的观念以及这个概念所包含的意义,是如何认识的?我们的认识达到了何种程度?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仅仅是把它作为一个时髦的概念,一个流行的名词,还是在真正理解了它的本义之后形成的自觉意识,并在这种意识指导下制定相应的战略和规划?

在更为深刻的层次上,对于研究型大学建设的思考与规划,不仅涉及一所大学自身的发展战略,而且事关一国高等教育的宏观布局结构和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毋庸置疑,中国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

展,需要有一大批具有高质量的研究型大学提供智力和人力的支持;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也为建设一批研究型大学创造了客观条件,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国究竟有多少所高等院校已经基本具备建设研究型大学的条件?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能提供多少众多研究型大学所需要的高质量的学生和教师资源?我国的国力究竟能支撑多少所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型大学?

另一方面,既然“研究型大学”的概念(无论是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分类还是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定位)直接来自于美国,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事实上已经成为我国相当部分高校发展的“样板”,那么,就有必要广泛和深入地了解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分类的由来,更主要地,是要把握美国的研究型大学过去是如何发展的、现在又面临哪些问题以及未来可能的走向。只有这样,研究型大学才不会只成为一个概念或流行的词汇。

我以为,如同高等教育中出现的种种现象一样,一哄而起的建设研究型大学“热”,实际上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界目前虚假繁荣和浮夸躁动的表征之一。作为学者,是难以凭借个人之力改变这种现实的(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但至少可以通过自己的学术工作为改变现实提供一些依据和工具。这是我和我的学生们近几年来之所以致力于大学史研究和编译(《美国研究型大学探索译丛》是整体工作的一个部分)的主要出发点和目的。我们希望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至少能为我们的读者带来一些启发,以拓展和加深对现代大学和研究型大学本质的认识和理解,从而在实践中减少一些盲目者、盲从者和盲动者。

在《美国研究型大学探索译丛》(第一辑)即将与读者见面之际,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同事们(特别是王英杰教授)所给予的大力支持。王英杰教授对书目的确定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指导意见。我感谢我的学生们。几年来,他们的热情和辛勤的劳动激励我锲而不舍地完成这项工作。在与他们的共同劳动中,我从他们身上获得了非常有意的教益。

我感谢蔡冠深先生、蔡制嫔先生和新华教育基金会的大力支持。本译丛作为北京师范大学中美教育研究中心的一期研究成果,得到了新华教育基金会的积极支持。

我难以用言语表达我对河北大学出版社前社长宫敬才教授的谢意和敬意。他不仅把这套译丛列为该社“十五”的重大选题,而且不断支

持和督促我的工作。我深深感谢河北大学出版社的臧燕阳同志。三年来,他为联系版权等事务花费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劳动。

张斌贤

2007年1月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注释

①Hugh Graham and Nancy Diamond: *The Rise of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ies: Elit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Postwar Era*.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53.

②Carnegie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 *A Classification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Berkeley, Calif.: Carnegie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 1973.

③<http://www.carnegiefoundation.org/>

中文版序

我们很高兴中国的同行将此新书介绍到中国,同时我们也希望本书所探讨的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的一些成就及问题能够有助于中国的大学发展。

尽管我们的历史与文化有着不同的渊源与发展,但作者完全相信我们的公立研究型大学有着相似的现实问题与多样化发展追求。的确,我们都肩负有知识传递(如: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教学)、知识创造(如:研究创新)以及知识推广(如:社会服务)的重要职责,公立研究型大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这种功能的多样性。随着近些年来中国的改革、市场化发展以及 WTO 的加入,人们也日益期望具有核心作用的公立研究型大学能够发挥其多重的职能。

此外,我们的问题也不同于西欧、东欧以及拉丁美洲国家。我们正面临着校园外部的、来自政府与私人部门的巨大社会变革。为适应这种社会的变革,我们就必须改革我们的课程及服务。这些新需求的核心就是新的入学压力、新的课程教学、新的服务内容以及新的科研活动的巨大张力。据估计,中国近十年来中学毕业进入大学的总人数已经增长了十五倍,(高等教育)资源愈加稀缺,这样增长的压力就直指研究型高等学府。

公立研究型大学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在许多方面,该问题对这类大学来说比大多数非研究型大学或其他两年制高校都有其特殊意义。政府越来越倾向于对我们的此类高校提供更少

的支持,而其他公共服务类需求(如初等和中等教育以及卫生事业)却成为资源增长的赢家。这是因为,人们没有很好地认识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公立高校没有将它们的科研或服务作为自己职能的重要部分。然而,期望成为各自国家“旗舰”大学的公立研究型大学显然必须承担此使命。从这些研究型大学的社会服务中所产生出的“公共物品”,这也是绝大多数国家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显然是被低估了。而且,高校以及此类服务也没有得到应有的经济支持。所有这些不同的变化对我们的研究型大学未来发展的潜力以及活力影响必然是重大的。

随着政府对公立研究型大学补助的周期性减少,我们必须寻找新的财源。若缺乏稳定乃至增长的财源,教师的工资必将继续下降,这样我们必将失去高校最宝贵的资源——我们的教师。此外,缺乏适宜的财力,我们的校舍维护无以补给,我们的实验室、图书馆等相应配备都将难以适应高质量的教学及科研。政府及高校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将取决于这些高校未来的突出贡献。我们的研究型大学要么适应、发展而令人刮目相看,要么走向默默无闻。

在过去的15年中,中国已经进行了两项全国性的结构大调整,但仅是部分地触及到此经费下降问题。一项是为适应当前经济规模效益及效率的大规模放权与整合,这方面最近的报道是612所相对较小的高校被合并为250所大学。另一项变革是要打造知名的世界一流的研究型的巨型大学,此尝试是否成功,尚暂无定论。

每所大学都面临着自己独特的选择路径,实际上并不存在一条所有大学寻找财源的最佳渠道。但是,无论何种选择,都必须尽力避免使公共机关认为,高等教育,特别是高水平的公立研究型大学,无需社会的巨大补贴与学生资助投入就可获得自身发展的足够新资源。高校的新途径所能募集到的资金是有限的,政府的进一步资金抑制必将继续恶化世界上许多国家高校业已存在的困境。公立研究型大学作为提供具有特殊价值的公共物品与个人物品的机构,保持其作为接受政府资助的地位十分必要。

例如,我们整个美洲几乎所有的公立研究型大学都在寻求资金多元化的替代模式,这与今天的中国极为相似。中国大多数人的共同反应就是价格问题,许多高校的学杂费上涨。很多高校以不同的方式收

费,如:根据学生的学习专业、课程数量、学位级别及其他项目等。中国的家长对高等教育的预期收益非常高,他们愿意将增长的收入投入到这方面。然而,(高校)若完全依赖于此资源,可能对低收入家庭以及国内资源分配都会导致很大的负面效应,对此问题应引起政府足够的重视,学生资助也是不可或缺的。

另外,我们的公立研究型大学在寻求财源的过程中开始注重科研能力与分析能力的重组。许多大学已经建立了技术转让办公室,以提高高校科研资金回报的机会,有些高校制订了服务收费制度,提供“研发”建议咨询服务。后者主要是针对政府及私人的资源,已成为支撑美国研究生教育的重要资金来源与支持。

许多高校现在正瞄向一些附属企事业单位,私立高校开始通过医院、音乐厅、体育馆、书店、出版社、餐厅、宾馆以及礼堂等机构开辟财源,公立高校也纷纷效仿。公立研究型大学的许多土地和设施常常没有得到开发利用,它们也能够创造额外的资金。

与第三部门的特许经营与合作也是高校创收的成功途径。许多研究型大学为了增加收入,允许其他部门使用高校的资源,如高校专家、课程资源甚至大学品牌等。最近,北美、英国及澳大利亚的大学的海外合作就属于此类活动,中国的一些主要研究型大学不参与代表本国的类似合作,这是不应该的。

最后,校友、私人、基金会和公司的资助和馈赠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近些年来,北美及北欧的公共研究型大学莫不如此。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中国在这方面也会取得进步。我们希望本书能够就此类相关的问题引发人们的深刻思考。

达雷尔·R·刘易斯

詹姆斯·赫恩

二〇〇四年七月

译者前言

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二战”后开始转向了美国。虽然美国国力强盛、经济富足,然而,在 20 世纪的后 20 年,政府对大学的投入却逐渐萎缩了。政府对大学的这种态度是否公允?大学自身又应当如何面对?在明尼苏达大学成立 150 周年之际,许多教育界、经济界的专家聚集一堂,共同探讨了公立研究型大学非同寻常的价值。



美国各州对高等教育拨款的大幅降低,并非偶然,这是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经济发生滞胀的结果,也是其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必然趋势。

自 20 世纪 60 年代肯尼迪总统执政后,美国为了摆脱其经济低增长的困境,果断接受了凯恩斯主义“增长性财政政策”,实行以刺激经济连续性增长为目标的长期预算赤字财政政策。其继任者约翰逊进一步发动了“伟大社会”执政纲领,加大了联邦对社会多方面的经济支出。然而,到了此后 20 世纪 70 年代,在“石油危机”的打击下,美国的经济却长期在“滞胀”中徘徊,高失业率与高通货膨胀长期并存。凯恩斯主义在美国意味着彻底的失败。1981 年里根入主白宫后,大量地削减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福利项目,压缩联邦支出,控制联邦赤字,政治上走向了新保守主义。

与财政政策紧缩相一致的是美国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政府所推行的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改革。新公共管理就是采用商业管理的理论、方法及技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以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及公共服务质量。里根政府大规模削减政府机构和收缩公共服务范围,就是将私人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引入公共部门管理领域之中,以提高政府效率。这些改革措施都强化了政府对教育的市场化取向,进一步将高等教育引向商业竞争的模式,以减轻政府的财政包袱。

同样是 20 世纪 80 年代,根据高等教育资金多元化的发展特点,经济学家布鲁斯·约翰斯通(Bruce Johnstone)进一步提出了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理论,并很快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该理论设定,高等教育的成本主要有四方面的来源:政府、学生家长、学生个人以及机构或个人捐助者。过去,高等教育成本几乎完全由政府或纳税人负担,新的教育经济理论则建议转向至少部分依靠家长和学生负担,学生及其家长交学费补偿部分教学成本,或支付使用费用以补偿由政府或大学提供的住宿费和膳食费。该理论对现实的分析是深刻的,但是,它同时也为政府推卸一定的教育责任提供了支持。

二

由于高等教育事业本身的高科技特征,高等教育的成本增长是加速度的,普遍高于社会的人均收入。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需求下的今天,就面临着深刻的财政矛盾,即学费增长是依据成本的增加,还是根据社会的人均收入水平?如果是后者,那么,高校的财政缺口如何解决?实际上,世界各国对教育问题的重视都在与日俱增,但对于教育经费问题,似乎都面临着财政的压力。其问题的实质,仍是对教育的认识问题。在财政上,对高等教育的经济投入与产出的计算或评估,一直是教育经济学的难题。参加明尼苏达大学庆典研讨会的本书作者们,正是对大学经济价值与非经济的价值全面考察,以向人们重新挖掘公立研究型大学的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社会价值。本书对一些教育经济学问题的探讨是深刻的,甚至开拓了教育经济学的新领域或新应用,诸如:

(一)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s)原理。乘数效应是指最初的活动

获得扩大的效果。在对高等教育的经济产出计量中,他们运用美国经济分析局建立的多种行业投入与产出系数模型,选取了社会各行业的平均系数 1.9 来保守地计算高等教育的整体经济效益,努力做到了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的数量化。他们以明尼苏达大学为例,明尼苏达大学经常性支出为 3.694 亿美元,对员工的支出 12.149 亿美元,再加学生的 5.647 亿美元和来访人员的 0.247 亿美元花费,一所大学在州内的直接花费初步的估计就是 21.737 亿美元。按照 1.9 的系数运算估计,此经济的产出将会达 41 亿美元。这里就揭示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政府对一所大学所进行的投资,又通过消费的形式返回给了当地,进而拉动了经济的发展,而且,它还具有更持久的“引资”作用,将外地甚至国外的人吸引到当地来消费。政府部门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只看投入,而不见产出。

(二)公共物品原理分析。对高等教育的理解,如果仅从表面、短期经济角度来认识,未免太浅显偏颇。人们对教育属性认识的重大突破就是公共物品原理的引入,它成功地分析了教育的多重社会价值。相对于私人物品,公共物品的根本特点就是消费的非排他性,一人的消费并不影响其他人的充分消费。正是此特征决定了其消费或收益是难以控制的,在自由市场下公共物品或者具有外在性的准公共物品必然会供应不足。这时,能够对自由市场进行调节就只有政府,也只有政府应该为公共物品的外部性“买单”,如此方能促进社会发展的整体协调。这一原理从根本上揭示了试图对教育产出进行单纯经济计算的荒谬所在,也进一步证实了政府所不可推卸的教育责任。

(三)个人经济贡献的计算。我们对人才价值的认识往往是重在其社会意义,很少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直接的探讨。对于做出重大发明贡献的人,我们都知道他是有价值的,但一位“普通人才”对社会的经济贡献可以衡量吗?本书通过税收指标计算,得出了一个人较为准确的经济贡献大小,其研究方法也有很大的启示作用。他们以收入比较法进行研究,即将获得大学毕业的平均收入与同龄中学毕业的平均收入进行对比,其差额就是高等教育对个人所带来的收入增加,再用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计算,那么就可得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所做出的税收贡献。他们对明尼苏达大学的计算是,每位大学生在其工作年限内增加部分的收入税将达 57,018 美元,相对于州政府在大学四年期间对

每位大学生的总补助 22,344 美元,每人仅收入税一项的增加就是州政府原教育投入的 2.5 倍。若再加上大学生们在本州的个人消费所带来的新就业机会以及扩大消费等多种效应,个人的社会经济效益更为可观。

(四)非经济效益的评估。作为人才培养工程的高等教育,若仅以投入——产出的模式计算其经济价值,具有很大的片面性。但是如何证明其非经济效益?传统上,大学证明自己贡献的方式往往是习惯于摆出自己所培养的知名人物、重大研发成果等等。这样虽然说者信誓旦旦,但听者总有隔靴搔痒之感。而事实上,教育对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书所提到的一些研究认为,教育影响了二十个单独的非市场领域,其包括了市场与非市场的生产力、非工资报酬、闲暇、知识生产、家庭内在生产力、下一代孩子质量、个人与家庭的健康、生殖力、娱乐、消费效率、寻找工作效率、婚姻选择效率、减少犯罪、社会融洽、技术改变、收入分配、积蓄、慈善赠予。正如本书第九章的研究,大学经历本身就是个人的人力与社会资本的孵化器。个人成长中的许多关键性认知方式、社会行为及思维习惯都与在大学阶段各方面的培养和成长经历有关。此外,大学同伴也是教育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的发展发挥了直接的作用,诸如:社会问题与政治参与的兴趣,热望、信仰和文化意识,知识获得、专业技术和习惯,自我意识,利他主义等。这样本书对大学非经济效益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我们的传统视野,进一步丰富了高等教育的非经济价值。

三

美国的公立大学始于 19 世纪初,1862 年联邦政府颁布《赠地法案》后,公立大学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与此同时,以霍普金斯、芝加哥大学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模式,借鉴了德国大学重视科研创新的办学理念,也得以快速发展。在美国公立大学的发展,威斯康星大学以其为社会公众服务的“思想”而标榜史册,成就了具有美国实用主义风格的大学新理念,扩展了对高等教育多元发展的认识。然而,比明尼苏达州的成立还早七年的明尼苏达大学(建立于 1851 年),在开拓高等教育的新使命方面并不落伍,正如其前校长麦哥拉斯(C·Peter Magrath)所言,

明尼苏达大学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它是全州的,为全州人民提供高等教育和社会服务。可以说,正是有像明尼苏达大学这样的一批大学,坚定地、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服务,并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威斯康星思想”才能够顶住坚持传统大学观人士的批判与责难,最终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

事实上,明尼苏达大学发展的成绩也是骄人的。特别是“二战”后,明尼苏达大学已有 55,000 名学生(1975 年),曾拥有五所校区,所开展的工作包含了从本科生到研究生、专业学位的教育,以及科研参与和社会服务等。它经过了艰难的成长历程,至今已是系列齐全、职能多样,全国最大,也是最综合的大学之一。作为主要依赖于州政府拨款的公立大学,它今天的发展也面临了严重的财政困难。实际上,明尼苏达大学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在美国的公立研究型大学中具有普遍性,其一举一动,都值得美国高等教育界的关注。本书主要是以明尼苏达大学个案探讨的形式,通过深刻、翔实的事实,精辟的逻辑分析,借以揭示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所普遍面临的问题以及大学与政府的发展趋势。正如本书的分析,高等教育价值的实现是滞后的,也正是因此,其价值更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和偏见。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维持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的整体繁荣富强。要真正做到这些,教育的发展是决不可忽视的。

在州财政拨款削减的情况下,明尼苏达大学没有消极等待,而是通过进一步加强为公共服务的努力,通过实践改革来证明公立研究型大学的未来发展之路。本书作者是来自于高等教育、政策、经济和历史等多门学科的专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表达出了相似的学术观点,充分肯定公立研究型大学在现代社会中应有的价值,将高等教育比做经济发展的“母机”。正如作者们对大学价值所充满的乐观主义精神一样,在公立大学处境窘迫的今天,他们对前景的认识仍是乐观的。其前校长马克·尤道夫(Mark Yudof)总结认为,州的财政困境是结构性的,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政治风向会改变的,我们应从此认识开始。作者的预言是有道理的,在“克林顿经济学”中,他就试图走中间偏右的“第三条道路”,把“生产性投资”,即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对公共工程基础设施的投资和高新技术的投资,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财政手段。正是借助高等教育的力量,美国也迎来了其世界新经济的领先地位。大学的